

试论《金瓶梅》中的礼赠描写

王雪蓉

(华东师范大学,上海 200241)

摘要:《金瓶梅》作为一部展现晚明社会百态的世情书,多处情节描写了小说人物间的礼物交换,不论是男女之间具有性暗示意义的礼物往来、信物赠送,还是在家庭、社会中具有社交功能的礼赠行为,都体现了礼物的社交功能,是小说暴露现实、书写世情的重要手段。

关键词:《金瓶梅》;礼物;世情

中图分类号:I207.41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21)20-0011-02

DOI:10.12228/j.issn.1005-5312.2021.20.146

中国被称为“礼仪之邦”,古往今来,礼物在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西方学者更多地从社会学、人类学的视角出发,将礼物和馈赠行为联系起来,作为一种社会交换来理解,即礼物的意义产生于其交换的过程中^①。礼物的流动过程常常显示出参与者的权力、财力状况与社会需求。这种礼物流动在《金瓶梅》所描绘的晚明社会中体现得尤为典型,不论是男女之间具有性暗示意义的礼物往来,还是家庭、社会中具有社交功能的礼赠行为,都反映了送礼、收礼背后的人情世故,是晚明社会背景的体现。

潘金莲作为小说女主角,其“淫妇”形象已深入人心,她的一切行为和心里都围绕性欲而展开。在性欲的支配下,她只想“养汉当饭”,甚至众人皆求的“财”都要为“性”让步。作为底层女性的潘金莲无财无权,仅有可以作为社会交换资本的便是其肉体。在嫁入西门庆家之前,第十回,她得知西门庆另娶孟玉楼后,在花笺写下《寄生草》,托玳安捎给西门庆传递情思。这是当时没有经济来源的潘金莲除自己的身体之外唯一可以交给西门庆、适合传情达意的物品。

潘金莲不像吴月娘,出身官家小姐;不似孟玉楼、李瓶儿继承亡夫财产后身家殷实;在嫁入西门府后,她也不刻意攒钱,每次向西门庆索要财物,都是出于同其他人攀比的心理,而不是财产积累。潘金莲在西门庆家中无疑是弱势的,尽管她可以在西门庆其他妻妾间挑拨离间,在西门府上搬弄是非,但在真正收到西门庆的要求时她是无力反抗的。^②第十二回中,西门庆梳笼李桂姐,在其挑唆下索要潘金莲的头发交给李桂姐施行巫蛊。作为身体的一部分,古代女性几乎不会剪去青丝,尽管潘金莲也再三求情说此前从未剪过头发,但在西门庆的一再哄骗、要求下只好交出,并嘱咐说“你要做网巾,奴就与你做,休要拿与淫妇,教他好压镇我。”潘金莲明知将头发交给西门庆有被“压镇”的可能,也的确因此而受到巫蛊诅咒,但还是在夫权威势下将自己的头发交出来。之后,西门庆尸骨未寒,连出身妓院的李娇儿都“盗财归丽院”,而潘金莲却是“售色赴东床”,尽管出路未知,她也未曾想过自己携财物逃离,而是继续以身体作为资本,寻求其他男性庇护。

最终,潘金莲怀着对武二郎身体的向往,以为自己的性欲可以在他那里得到满足,却死于这位理想型情人的刀下。

《金瓶梅》中,除了象征人格尊严遭受践踏的受辱剪发,也有

自愿将头发作为信物赠与情人的情节。崇祯本第七十九回“原来王经稍带了他姐姐王六儿一包儿物事,递与西门庆瞧,就请西门庆往他家去。西门庆打开纸包儿,却是老婆剪下的一柳黑臻臻、光油油的青丝,用五色绒缠就了一个同心结托儿,用两根锦带儿拴着,做的十分细巧。又一件是两个口的鸳鸯紫遍地金顺袋儿,里边盛着瓜瓞儿。”王六儿多日未见西门庆,将代表“情思”的青丝缠成的同心结与装着瓜瓞儿的荷包作为信物送给西门庆,以此勾引他,从而获得西门庆的赏赐。传统的“结发情深”象征的神圣爱情在这里被消解^③,作为礼物的“青丝”体现着西门庆在与女性交往中的权威地位。

小说中,女性的衣饰作为展示其身体魅力的媒介,同样成为具有性隐喻的礼物。既无正妻地位也无丰厚财产的潘金莲,为了增加其身体的吸引力,向西门庆索取的礼物往往是衣饰而非钱财。西门庆在与女子欢好时也常常提出赠与她们衣饰,如第七十九回对王六儿说“问甘伙计铺子里取一套衣服你穿,随你要甚花样。”《金瓶梅》中女性常以金簪赠男子表示爱意,孟玉楼刚嫁入西门庆家中时,赠与西门庆刻着“金勒马嘶芳草地,玉楼人醉杏花天”的金簪,后被潘氏的“并蒂莲瓣簪儿”换下;李瓶儿第一次与西门庆偷情后,也“将头上关顶的金簪儿拔下两根来,替西门庆戴在头上,说道:‘若在院里,休要叫花子虚看见。’”可见,女子使用的金簪在当时被默认为只会赠送给发生过性关系的人。小说后文中陈敬济拿刻有孟玉楼名字的金簪妄图诬告的情节也印证了这一观点。此外,男女议婚相亲时的礼物往往也是衣饰。第六回,西门庆娶孟玉楼时:“便叫玳安用方盒呈上锦帕二方、宝钗一对、金戒指六个,放在托盘内拿下去了。”第三十七回,将韩家女儿嫁给翟管家时:“西门庆与他买了两匹红绿潞绸、两匹绵绸,和他做里衣儿。又叫了赵裁来,替他做两套织金纱缎衣服,一件大红妆花缎子袍儿。”翟管家娶妾是为了“图生长”,因此陪嫁的衣物绸缎自然也是为了增强女性身体的吸引力。

礼物的馈赠往来也是《金瓶梅》中女性之间交往的普遍行为。《金瓶梅》成书约在明代隆庆至万历年间,即公元1567~1620年间,已是明代的中后期。晚明高度发展的封建经济之下,资本主义萌芽开始,商品经济迅猛发展,礼物交换在女性的社交活动中所发挥的关键作用,显示出女性可支配财物具有更高的商品价值。这种重要的社交行为不仅推动了故事情节的发展,也使我们得以从中窥见晚明的世俗生活与社交方式。

相较于女性赠送首饰给男性过程中含有的性意味，女性之间互赠首饰往往起到讨好、收买人心的作用。第十三回，西门庆用李瓶儿给自己的寿字金簪假托是送给潘金莲的，使潘氏掩护二人的偷情；到了第十四回中，潘金莲特意戴着的与李瓶儿一样的寿字金簪，便让吴月娘识破了西门庆和李瓶儿的私情。李瓶儿只好说“大娘既要，奴还有几对，到明日每位娘都补奉上一对儿”来讨好西门庆府上原本的妻妾。不仅如此，李瓶儿一进门，见到吴月娘便“插烛也（似）磕了四个头”，见了李娇儿、孟玉楼、潘金莲等妾室也磕头礼拜，连称“姐姐”，就连见到地位较低、“妆饰少次于众人”的孙雪娥也起身行礼。留宿西门庆家中时，“到次日起来，临镜梳妆，春梅伏侍。他因见春梅灵变，知是西门庆用过的丫头，与了他一副金三事儿。”新妾李瓶儿对地位较低的丫鬟都极尽收买之能事，不仅体现其身家富足，更是她日后嫁入西门庆家中处事方式的征兆：尽量与人为善，事事忍让。嫁入西门庆家中后，李瓶儿在戴自己拥有的金丝髻髻前，都要先问过西门庆“上房他大娘众人，有这髻髻没有？”西门庆回答没有，李瓶儿便说这样“我不好戴出来的”，托西门庆帮自己打造成吴月娘有的样式，足见其处处小心、时刻留意。

西门庆与李瓶儿之间的礼物往来还体现出在此二人的感情关系中，李瓶儿处于绝对弱势的一方。李瓶儿为潘金莲祝寿，出手了宫中才有的寿字金簪若干；但李瓶儿做寿时，西门庆仅“差玳安送了四盘羹菜、一坛酒、一盘寿桃、一盘寿面、一套织金重绢衣服”，礼物的简陋足以看出当时他对李瓶儿并没有格外用心。

小说中其他女性间的礼赠往来，如第三十二回，因西门庆升官，为了“宅里好走动”，李桂姐“买了四色礼，做了一双女鞋”要拜月娘做干娘，之后“月娘与了李桂姐一套重绡绒金衣服，二两银子”作为回礼；为与李桂姐相争，在应伯爵建议下，第四十二回“吴银儿先送了四盒礼来，又是两方销金汗巾，一双女鞋，送与李瓶儿上寿，就拜干女儿。”李瓶儿以“一匹松江阔机尖素白綾”回赠，这类礼赠往来都是勾栏中的妓女在钱权的吸引下攀附富户太太的办法。在西门庆死后，女性之间的礼物赠送多了真正表达友情的意味。第八十五回，吴月娘识破春梅与陈敬济的奸情后将其逐出家门，本来吩咐“休教带出衣裳去”，但另一位丫鬟小玉还是“一面拿出春梅箱子来，是戴的汗巾儿、翠簪儿，都教他拿去”，还“头上拔下两根簪子来递与春梅”，潘金莲也“拣了两套上色罗段衣服鞋脚，包了一大包，妇人梯已与他几件钗梳簪坠戒指”，为的是春梅出府后可以好过一些。第八十六回逐金莲出府，在吴月娘打点允许潘金莲带走的东西之外，孟玉楼又“瞒着月娘，悄悄与了他一对金碗簪子，一套翠蓝段袄、红裙子”，小玉也“悄悄与了金莲两根金头簪儿”，这两处本是西门庆死后妻离子散的情节，却体现了几位女性间的友谊，是书中少有的温情。

作为商人的西门庆深深懂得结交政府权贵的重要，为了寻找靠山，他只看对方家庭背景就可以将女儿嫁出去，连自己也拜高官做干爹，更不必说以财礼贿赂、谋求官职、依官势生财了。

首先，在前期，西门庆作为商人，在法律层面的案件审理上，他常常靠赠送礼物来收买、贿赂主管官员，从而达到目的。小说第十回中，武二误杀了人，西门庆“馈送了知县一副金银酒器、五十两银子，上下吏典也使了许多钱”，想借知县审案判处武二死刑，以此为自己与潘金莲毒杀武大一事免除后患。第五十九回，西门庆通过长途贩运、贱买贵卖来牟取暴利：其管家在杭州置了一万两银子缎绢货物，到达临清钞关，因缺少税钞银两而未曾装载进城。西门庆叫陈敬济后边讨五十两银子，令书童写一封书，

第二天一早，送给钞关上的钱老爹，教他过税之时“青目一二”。按照明朝税制，价值一万两银子的绸缎货物应当纳税三百多两银子，但经过税卡时，因为西门庆用五十两银子行贿，得了钱老爹的一封人情书信，货物得以“两箱并一箱，三停只报了两停”，最后连货也不验，“通共十大车货，只纳了三十五两钱钞银子”，事后西门庆还“少不的重重买一分礼谢他”。这里便是西门庆行贿来偷税漏税，获得最大利益的商业行为。

《金瓶梅》描写的西门庆社交圈中，祝寿送礼也是重要的社交行为，且体现出西门庆对人情世故的通达：第十六回，为帮闲应伯爵做生日时，他只“封了三钱银子人情”；而帅府的周守备生日，西门庆“封五星分资、两方手帕，打迭衣帽齐整，骑匹大白马，四个小厮跟随”去祝寿，这是西门庆基于对身边不同人社会价值的认识做出的礼物选择。为蔡太师生日送礼就更为用心，第二十七回，西门庆“打点三百两金银，交顾银率领许多银匠，在家中卷棚内打造蔡太师上寿的四阳捧寿的银人，每一座高尺有余。又打了两把金寿字壶。寻了两副玉桃杯、两套杭州织造的大红五彩罗缎紵丝蟒衣”，加上李瓶儿献出的“两件大红纱，两件玄色焦布，俱是织金莲五彩蟒衣”，一齐打包送往东京与蔡太师贺寿。到了第三十回，为蔡京奉上的“黄烘烘金壶玉盏，白晃晃减赉仙人。锦绣蟒衣，五彩夺目；南京纁缎，金碧交辉。汤羊美酒，尽贴封皮；异果时新，高堆盘盒。”看到如此丰厚的礼物后，蔡京询问来保，得知西门庆并无官职，便马上判断出其送礼意图，提出让西门庆在“山东提刑所做个理刑副千户。”这一职位作为给他的回礼，由此西门庆便靠上了蔡太师这座大山，踏上仕途。

得到官位后的西门庆自是春风得意，来攀附结交西门庆的人自然多起来，而赠送礼物表达祝贺同样是最直接的增进关系的方法。做官之后，西门庆由行贿者变为受贿者，如小说写到苗青本是人家的小厮，害死主人以后霸占了主人的所有财产和妻妾，如此重罪，通过贿赂了西门庆便可以逃过法律惩罚。第三十一回，薛大监差家人“送了一坛内酒、一牵羊、两匹金缎、一盘寿桃、一盘寿面、四样嘉肴”来西门庆家中“一者祝寿，二者来贺”，值得注意的是，西门庆府上是加官、生子双喜临门，但此时他没有准备庆贺官哥儿出生之礼，到了第三十二回，薛太监为了官哥儿的出生又添上“戛金方盒拿了两盒礼物：烟红官缎一匹，福寿康宁镀金银钱四个，追金沥粉彩画寿星博郎鼓儿一个，银八宝贰两”，第五十八回仁医官以“一方寿帕、二星白金”与西门庆拜寿。

“送礼”在这里便西门庆进行钱权交易的主要方式，朝廷的法律与制度在金钱面前形同虚设，就连当朝太师也因西门庆这位远客送礼多而“见西门庆到了，忙走出轩下相迎”，可见晚明社会资本主义萌芽对封建等级制度的冲击。

《金瓶梅》的价值，在于它是中国第一部完整、深刻的世情书，既有对外部社会形态的本质揭示，又有对人性的丰富而立体的展示。小说的礼赠描写是暴露现实、书写世情的重要手段。《金瓶梅》花费了大量笔墨描写西门庆和各级官员之间的应酬往来，以及西门府上女子之间、男女之间的相互馈赠，上寿、迎送、宴请、送礼常年往来不绝，这种礼赠往来正是中晚明资本主义萌芽时期商品经济的发展与官场文化、社会文化的缩影。

注释：

①（法）莫斯. 礼物：古式社会中交换的形式与理由[M]. 汲喆（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06）：4.

（下转第16页）

也倒映在野蛮与落后的民间习俗中。

三、在光明和黑暗之间,他们更喜欢沉湎于后者,似乎在没有光明的地方,只有在“黑暗心灵中舞蹈”,才能强烈体验到残酷的激情

人性是趋光的,但是在中国当代文学的作家群中总有一部分作家热衷于黑暗,无黑暗不狂欢,似乎黑暗才是文学的本义,卖火柴的小女孩的微弱光亮不足以驱赶黑暗,所以黑暗必将沉淀许久。余华的前期小说是这方面的个中翘楚。也许余华5年牙医职业生涯与他在医院度过的童年、少年和青年时代,他耳闻多年的锐哭和惨叫,与他目睹多年的一桶又一桶血肉模糊的东西,使余华的作品充满黑暗、血腥暴力,正如他的好朋友莫言说:“毫无疑问,这个令人不愉快的家伙,是个‘残酷的天才’,也许是牙医的生涯培养和发展了他的这种天性,促使他像拔牙一样把客观事物中包涵的确定性意义全部拔除了。据说他当牙医时就是这样:全部拔光,不管好牙还是坏牙。这是一个彻底的牙医,改行后,变成一个彻底的小说家。”^[4],这个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得恨,余华的未来小说充满鲜血,和他的这段牙医生涯还是不无关系的。所以在余华所营造的黑暗王国里,《现实一种》、《鲜血梅花》《古典爱情》。亲情之黑、江湖之暗,人性之残一一呈现。同样作家残雪也是“黑暗之翼”,《山上的小屋》处处人性黑暗,互相猜疑,父亲随时要弄断我的手臂,母亲眼冒绿光,随时吞噬我,一个个毛骨悚然,紧张的画面让黑暗的小屋充满恐惧。

四、在善与恶之间,他们倾向于以夸张的方式续写人性的凶暴和残忍

人之初性本善还是性本恶,从未有过定论,善恶从未确定,也不能严格区分,然而在求善还是趋恶中,一些作家选择了恶,《现实一种》作者余华描述的是这样的“一种现实”:山岗的儿子不慎摔死了山峰的儿子;山峰复仇,踢死了山岗的儿子;山岗巧作算计,除掉了其弟山峰,随后被捕、被毙;山峰的妻子则谎称自己是山之妻而将“丈夫”山岗的尸体捐作医用;山岗的身体被一群医生肢解、取用、扔弃,而他的睾丸则移植到另一个年轻人身上,从而在“绝后”之后而又神奇地“后继有人了”。然而在这窒息般的行为背后却是将温情脉脉的家庭伦理道德放置在十分可笑的尴尬境地。莫言的《檀香刑》将“高密东北乡”作为精神磁场,将高扬的群众运动,耸人听闻的严刑,生死相依的爱情杂糅在一起,通过眉娘与众多男性间的红尘纠葛,生死较量展开。对于凌迟的描写莫言唯恐没有描述仔细:“首先刽子手要猛拍犯人的心窝一掌,然后操着刀子,灵巧地一转,要把一块铜钱般大小的肉,从犯人的右胸脯上旋下来。这一刀恰好要旋掉乳粒,留下的伤口

酷似盲人的眼窝。”^[5]凌迟本是惩罚恶人,但在执行时自身也在犯恶,无视人的尊严,践踏肉身,呈现出“真理秩序与既定意义的瓦解。”^[6]

五、在人性 and 兽性之间,嘲笑人类社会的“文明道德”,宣扬一种野性的“丛林道德”

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文明中,稻作文化圈总是占据主流,元朝和清朝游牧民族统一中国,丛林法则甚嚣尘上,似乎几千年的中华文明道德不值一提。马背上的民族靠弯刀,靠蛮性,当然也有智慧一统中原。然而一些少数民族征服的目的却是将世界变成一个巨大的牧场,所以他们只要地,不要人,例如蒙古人未攻占四川时,四川省人口2000多万,然而蒙古大军一过,人口骤降为80多万,这就是丛林法则背后的血腥,然而这种残酷的游牧文化却在姜戎《狼图腾》中放肆的夸大了(《狼图腾》曾一度被列为奇书,由此而后出现的《狼道》等大肆宣扬狼性文化,为游牧文化大唱赞歌),不可否认姜戎的《狼图腾》对于我们刷新对狼的认识,重建狼文化有重要的作用,然而姜戎在《狼图腾》中过高地夸大了狼的智慧,过高地宣扬了游牧文化,对中原文化表现出了不屑一顾,这是危险的,我们清晰地明白儒道文化对中国文化文明的影响,没有温良恭俭让的礼仪传统做支撑,华夏走不到今天。

中国文学本应善恶同行,本应健康积极向上,但我们时代的相当一部分“著名作家”,正如马斯洛批评现代的心理学的说,不仅“对人类所能达到的高度持悲观,消极、狭隘的观念,对人类的生活的抱负估计不充分,将人类的心理境界定的太低”(马斯洛《动机与人格》)这样,我们将什么留存于后代。可是,在我们文学界,还有一部分作家在迷恋这种变异的“单向度”的消极写作,并且嗜痂成癖,人类总体是向上的,我们的文学还是要弘扬正能量,歌颂人性的光亮面,黑暗在于揭示不在于品味,更不在于沉浸,所以,我们要警惕这种迷恋式的“单向度”。

参考文献:

- [1] 马尔库塞. 单向度的人——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研究[M]. 张峰, 吕世平(译). 重庆: 重庆出版社, 1988: 53.
- [2] 李建军. 时代及其文学的敌人[M]. 北京: 中国工人出版社, 2004: 57.
- [3] 张定浩. 竭尽全力的轻盈[M]. 上海: 人民出版社, 2018: 224.
- [4] 姜飞. 感性的归途——阅读20世纪中国文学经典[M]. 成都: 四川人民出版社, 2003: 348.
- [5] 莫言. 檀香刑[M].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01: 87.
- [6] John D. Caputo, The Weakness of God: A Theology of the Event, Bloomington Indianapolis[M]. Indiana University.

(上接第12页)

② 张平仁. 翻案与误读: 潘金莲研究反思[J]. 明清小说研究, 2015(02).

③ 高桂惠. <金瓶梅>「礼物」书写初探[J]. 国文天地, 2012(330).

参考文献:

- [1] 引文均出自齐烟、王汝梅(校点). 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M]. 济南: 齐鲁书社, 1989(06).